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6

清代卷(上)

朱赛虹 曹凤祥 刘兰肖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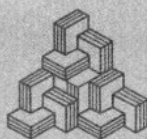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清
代
卷
(上)

6

朱赛虹 曹凤麟 刘兰肖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上)/朱赛虹,曹凤祥,刘兰肖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68 - 1788 - 2

I. 中… II. ①朱…②曹…③刘… III. 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清代 IV. G23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3913 号

责任编辑 / 毕磊 武斌

责任印制 / 熊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6 彩页 4

字 数 / 374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小 引	1
第一章 清前期出版业发展的社会背景	2
第一节 政治环境与经济概况	3
第二节 专制统治与文化政策	8
第三节 出版业全面发展	15
第二章 清前期中央官署的图书编纂	24
第一节 中央官署编修机构	24
第二节 中央官署出版物的内容及其文化贡献	33
第三节 翻译机构与翻译活动	73
第三章 清前期中央官署出版机构及其出版概况	82
第一节 中央官署出版机构及其出版活动	82
第二节 地方官署出版机构及其出版活动	120
第四章 清前期民间的图书编纂与著述	126
第一节 学术流派及私家著述	126
第二节 古籍整理的辉煌成就	134
第三节 编撰形式的发展与丰富	152

第四节	图书编撰学的实践与理论	160
第五章	清前期民间出版活动	165
第一节	坊肆出版	165
第二节	私宅出版	179
第三节	其他出版机构的出版活动	195
第四节	民间出版的地域分布特点	203
第五节	民间出版的历史贡献	211
第六章	清前期印刷技术的发展	213
第一节	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与提高	214
第二节	套印技术的不断完善	216
第三节	活字印刷技术的多种尝试	219
第四节	书籍版画插图的发展	238
第七章	清前期书籍装帧艺术	247
第一节	图书版式	247
第二节	图书字体	249
第三节	印书用纸	250
第四节	图书装订	255
第五节	图书装潢	256
第八章	清前期图书出版管理与流通	264
第一节	官府图书发行渠道与方式	264
第二节	民间图书发行渠道与方式	273
第三节	图书的对外交流	284
第九章	清代少数民族文字书籍的出版	286
第一节	四译馆及其编辑的《译语》	286
第二节	满文书籍的出版	288

第三节	蒙古文书籍的继续出版	314
第四节	察合台文书籍的出版	327
第五节	藏文书籍的继续出版	329
第六节	纳西东巴文和哥巴文书籍的出版	337
第七节	彝文书籍的继续出版	348
第八节	方块壮字书籍的编辑和流行	352
第九节	其他少数民族书籍的编写和流传	358
第十节	清代少数民族图书出版小结	370
附录一	出版大事记	372
附录二	参考书目	399
后 记		405

小 引

清王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和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它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是中国悠久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明末，政府腐败，居住在辽东的女真族崛起，建立与中央对抗的地方政权后金（后改为清）。公元1644年，清统治者借助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军事力量，夺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成果，入主中原，建立起封建专制统治。在这一过程中，连年用兵，东征西讨，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祸患。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不懈的努力，清政府在中国辽阔的版图内，使经济、文化逐步恢复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统一的国家里，我国各族劳动人民经过上百年的拼搏和奋斗，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史学家赞誉的“康乾盛世”。然而，清前期的社会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导致清朝的封建统治出现了衰败和危机。至乾隆晚期，各族人民起义武装反抗不断，其中白莲教起义遍及七省，清朝前期的统治也由盛极而衰。

清前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不同以往的显著特点，表现在出版事业方面，其发展状况、出版思想、出版内容、出版机构、出版技术、出版管理、版式特点、行款字体、装帧形制等方面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章 清前期出版业发展的社会背景

清前期的历史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止，共197年。从清朝的兴衰来看，我们可以把清前期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在全国的统治逐渐巩固。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处在剧变之中，持续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的急剧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思考，要求人们对各种现实问题做出回答。第二阶段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朝开始出现盛世。在这一阶段，清朝在全国的统治趋向稳定，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朝统治者稽古右文，发展文化。同时，又打击具有民族意识的汉族士人，迭兴文字狱。很多文人、学子受到迫害和摧残，大量典籍被毁坏，思想、文化界万马齐喑；社会下层的农民、奴婢、手工业者和商人反抗、斗争的呼声不断。这种呼声极大地震动着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戴震、曹雪芹等思想家、文学家拿起巨笔，对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理学进行批判，并断言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灭亡。第三阶段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清朝统治出现危机和衰败的征兆。在这一阶段，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把其触角伸向中国，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统治已经出现衰微。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考据学派无法解决。

于是，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经世致用之学受到学者的青睐。

与历史和学术的发展相对应，清前期也是我国出版事业发展史上的恢复、发展和兴盛时期。出版活动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在清前期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典籍出版规模、典籍出版数量、典籍印刷的质量以及典籍的装帧设计都举世罕见。清朝前期出版事业恢复、发展和兴盛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要从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去探究和考察。

第一节 政治环境与经济概况

清朝建立以后，在政治军事上执行了许多实现统一和巩固政权的政策，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出现了康雍乾的鼎盛局面。政治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为出版事业的发展、兴盛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

一、政治环境

（一）统一与稳定全国政局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并定都北京。清兵初入关时，为了稳定政权，清政府曾颁行一些安民措施。如为明崇祯帝发丧；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级，仍令视事。明朱姓诸王，亦仍保留王爵；一切加派如辽饷、练饷、剿饷，尽行蠲免；礼俗衣冠暂用明制，汉人薙发与否，听从其便等等。这样的政策对争取中原地区汉族的人心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两年之后清政府开始强制推行一些民族压迫政策，主要有“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五事，^{【1】}此外，在战争中还多次发生屠城之事。这种政策的实行，在清初的社会大背景下加剧了社会和民族矛盾。各种反清势力的活动也不断持续，如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余部、明朝贵族所建各南明小朝廷等。但是清军最终镇压了各种反清势力，并且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1】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三年十月乙酉。

康熙初年，南方的“三藩”割据江南数省，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三藩”即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和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在帮助清朝镇压农民军和南明各政权中扩大了实力的“三藩”，各自割据一方，势力日强，成为清中央政府的巨大隐患。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发动叛乱，广西将军孙延龄、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叛乱，迅速地占领了广西和福建。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占据广州，响应叛乱。一时“东西南北，在在鼎沸”，^[1]史称“三藩”之乱。“三藩”之乱延续了八年，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并影响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康熙帝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取得了平叛斗争的胜利。

【1】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一，《平定三逆述略》。

台湾是中国的宝岛，但是它曾经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郑成功驱逐了荷兰殖民统治者，收复了台湾。郑成功病死后，其子郑经割据台湾，发展成为地方割据势力。郑经和耿精忠勾结，参加“三藩”叛乱。郑经死后，其诸子内讧，台湾政局混乱。台湾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安全和统一，解决台湾问题势在必行。康熙二十二年（1681年），康熙帝命福建总督姚启圣同水师提督施琅率军渡海作战，攻占澎湖，郑氏集团惊恐万状，“莫不解体”，^[2]最后，兵败降清。清政府统一台湾后，设置台湾府，下辖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三县，另设道员一人，兼管厦门地方，隶属于福建省。台湾复归清朝的管辖。收复台湾，保卫了东南海域，阻止了西方殖民者的骚扰，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2】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上。

准噶尔贵族噶尔丹勾结沙皇俄国，发动叛乱。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率军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深入到内蒙的乌朱穆沁，打败了清朝的驻军。随后，乘胜南下，逼近距京师仅有700里的乌兰布通（内蒙克什克腾旗）。为了国家的安全，康熙帝亲自率师出兵塞外，指挥各路大军向乌兰布通进发，打败了噶尔丹的叛军，取得了乌兰布通之役的胜利。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与蒙古各部落首领于多伦会盟，进一步发展了清朝中央政

府与喀尔喀蒙古的关系，巩固了北部边防。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夏，噶尔丹再次对喀尔喀蒙古发动进攻，又一次点燃了叛乱的战火。康熙帝又率军亲征，在昭莫多打败噶尔丹，昭莫多之战基本上歼灭了叛军的有生力量，粉碎了噶尔丹的分裂势力，取得了平叛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噶尔丹败逃后，继续策划分裂祖国的叛乱，直接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率军亲赴宁夏，在清军压境的情况下，“噶尔丹败窜，部众离散，仰药死”。^[1]（图1）

康熙晚年，准噶尔首领策旺阿喇布坦趁西藏内部政局的变化，派兵袭击哈密，进兵西藏，杀死拉藏汗，进据拉萨，攻掠布达拉宫，造成西藏局势的混乱。清政府出兵西藏，驱逐了准噶尔叛军。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在西宁府周围的南川、西川和北川点燃叛乱的战火，雍正帝经过熟思详审，认为准噶尔割据政权的存在“为众蒙古之巨害，且恐为国家之隐忧”，^[2]派兵“捣其不备”，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统一了青海广大的地区。

乾隆帝即位后，两次对西北用兵，准噶尔割据分子“望尘请降”，^[3]清政府在彻底平定了准噶尔贵族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后，又平定了南疆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平定叛乱后，清政府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实行军府统治，设伊犁将军镇守新疆。并在当地驻兵、屯田，乾隆帝“派往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兵丁，已至一万数千”。^[4]

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通过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和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抗击沙俄入侵等同外部侵略势力和内部分裂割据势力的一系列重大斗争，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国家。乾隆时期，

[1] 《西陲总统事略》，卷一，《初定伊犁纪事》。

[2] 《清世宗实录》，卷七八。

[3] 《西域闻见录》，卷五，《西陲纪事本末》。

[4] 《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

图1
康熙帝读书像



清朝的疆域西到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北到唐努乌梁海，东北到外兴安岭、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东到东海，东南到台湾诸岛屿，南到南沙群岛，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规模。

（二）巩固中央集权

在进行军事斗争以统一政权的同时，清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来巩固中央集权。

首先，完善中央政府的各种政治制度。清初沿袭明代的内阁，仍以内阁作为政府的中枢机构，并承袭明代的票拟制度。在内阁之外，又设议政王大臣会议，皆由满族大臣组成，凡军国机要重务都不经过内阁票拟，而径由议政王大臣会议策划方案，最后由皇帝裁决。康熙时又有南书房，凡一切特颁诏旨，皆由南书房翰林撰拟，内阁之权更分。到雍正年间，清廷又普遍推行奏折制度，凡属密办之事，皆令官员使用奏折直达皇帝，由皇帝亲自批答，发还奏人付诸执行。由此许多题本变成例行公事，已无机要可言，内阁之权力遂大为削弱。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军机处以后，一切军国大政皆由军机处办理，内阁不过徒拥虚名而已。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中央机构又有各部院衙门，分掌各方面事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又有都察院，作为监察机关。有大理寺，作为审理刑狱的机关。理藩院是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机关，也掌管一部分外交事务。凡与俄罗斯交涉事宜，皆归理藩院办理。内务府是掌管皇帝家务的机关，其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由满洲贵族王公大臣担任。内务府的职权很广，凡宫廷的典礼、祭祀、库藏、财用、服御、赏赐、建造、供应、刑律等事，皆统于总管大臣。内务府的设立，为清代首创，是对历代皇帝家务管理制度的改革。

其次是建立完善的地方和边疆统治制度。在地方机构方面，分省、道、府、县四级。另外又有厅、州，或直属布政使司管辖，其地位如府；或属府管辖，其地位如县。清前期在边疆地区也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统治制度。如在内外蒙古地区，均实行札萨克制，即盟旗制度；在青海地区，设办事大臣一人，驻甘肃西宁府（今青海西宁市），专掌青海之军政；在新疆地区，设伊犁将军，驻惠远城（今霍城东南），又设参赞大臣为辅，总理天山南北路之军事、政治、边防诸务；雍正五年（1727年），设西藏办事大臣驻拉萨，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等等。

综上所述，清前期的统治者采取各种政策巩固了中央集权，使社会保持了长时期的稳定局面，为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经济状况

清初，经过长期的战乱和厮杀，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耕地大量荒芜，广大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到处是荒凉的景象。“荒田连陌千顷，其多者以里数计”。^[1] 面对严酷的现实，顺治帝吸取了历史上汉族统治的经验，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实行了“薄赋敛”的政策，顺治三年（1646年）又谕令户部：“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2] 并责成地方抚按，严格查核地方田亩，编纂《赋役全书》。顺治十一年（1654年），下令停收苏、杭等地的赋役。

康熙初年，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康熙帝实行蠲免政策，“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3] 他还招集流亡人口，开垦荒田，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康熙帝亲政后，又施行了重要的农业政策——更名田。他用“圣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税，这种做法有利于无地或少地的劳动人民。他还奖励农业生产，鼓励人们

[1] 《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八。

[2] 《清世祖实录》，卷五七。

[3]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1】陆陇其：《论直隶兴除事宜书》，《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八。

大面积垦荒。为了解决频发的黄河水患问题，任用靳辅治理黄河。这些措施，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恢复、发展的良好效果。自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1】}

雍正帝即位后，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政策，使地丁合一。这一举措废除了人头税，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改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乾隆帝即位后，实行减免赋税、招集流亡、开荒的政策。在其前辈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治理黄河、淮河水患，兴修水利，推广高产作物，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康熙帝、乾隆帝还实行恢复、发展手工业的政策。康熙帝将“班匠银”摊入地亩征收，手工业工人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证。乾隆时期，废除匠籍。从此，手工业者的人身获得了自由。这一政策有利于发挥手工业者的才智和创造力，促进了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随着手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增长。商业出现繁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大小城镇和农村市场日益增多，农产品商品化。到乾隆时期，北京、汉口、广州、佛山、杭州、江宁、苏州、杭州、镇江、无锡等发展成了繁荣的商城，全国普遍出现了丰裕的景象，社会由凋敝转向了繁荣。这是清前期出版业发展与繁荣的经济基础。

第二节 专制统治与文化政策

清朝入关，虽然用武力镇压了人民的反抗，但是，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依然存在，对清初的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清初的统治者认识到，只有消弭人民的反清情绪，维系民心，才能巩固封建政权。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诸帝深知“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为此，逐步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把争取士人作为施政的基本方针。对士人采取了恩威并施的两手政策，既优容和拉拢，又加以压制和迫害，在思想文化领域实施了一些重大举措。

一、宣扬儒家思想

顺治元年（1644年），御史曹溶就提出优恤死节之士，以鼓励风化。顺治帝采纳其意见。此外，尊崇孔子，宣扬儒家思想，以之为其政治服务。康熙、雍正和乾隆等几朝帝王通过给孔子上尊号，亲自到曲阜致祭等活动，确定儒家思想为治国思想。康熙帝制定、颁布“圣谕十六条”：一、敦孝悌，以重人伦；二、笃宗族，以昭雍睦；三、和乡党，以息争讼；四、重农桑，以足衣食；五、尚节俭，以惜财用；六、隆学校，以端士习；七、黜异端，以崇正学；八、讲法律，以儆愚顽；九、明礼让，以厚风俗；十、务本业，以定民志；十一、训子弟，以禁非为；十二、息诬告，以全良善；十三、戒窝逃，以免株连；十四、完钱粮，以省催科；十五、联保甲，以弭盗贼；十六、解仇忿，以重身命。^[1]这十六条充分体现了其利用儒家学说维护统治的思想。雍正帝则在向全国颁发的《圣谕广训》中对“圣谕十六条”加以解释和推阐。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命内府刊刻《大礼记注》，五年（1727年）刊印《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八年（1730年）刊印《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以此宣扬儒家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念，巩固封建秩序，加强封建专制统治。这些举措对汉族士人产生了积极、有效的影响，增加了他们对朝廷的好感。

【1】《清世祖实录》，卷三四。

二、大力兴学取士

为了扩大清政权的统治基础，争取汉族士人的归心，顺治帝提出，“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2]。顺治二年（1645年），顺治帝沿袭明朝的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康熙帝亲政后，提出“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储养之源，由于学校”^[3]，推动各地的学校建设。康熙十二年（1673年）颁谕举荐山林隐逸之士；康熙十七年（1678年）在原有正科之外，特设博学鸿词科，吸收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汉族士人。同时还增加“经济特科”和“孝廉方正科”等科举科目，并在诏书中说明“崇儒

【2】《清世祖实录》，卷三四。

【3】《清世祖实录》，卷九一。

【1】《圣祖实录》，卷四四。

【2】《圣祖实录》，卷七一。

重道，培养人才……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1】}。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录取的名额，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有利于国家政权的巩固。清初大臣范文程说：“治天下在于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2】} 科举考试使读书者有出仕之望，吸引了汉族士人，泯灭了他们的反清意识。汉族士人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封建王朝的拥护者，国家统一的维护者。

三、推崇程朱理学

【3】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九，《性理大全序》。

清前期的几代皇帝都熟读经书，特别是程朱理学。康熙帝认为，“发挥圣道者，莫详于有宋诸儒”，^{【3】} 他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亲自撰写《性理精义》，并诏令李光地审校。李光地崇尚朱熹之学，因而得到康熙帝的赏识。康熙帝任用他为翰林学士，编辑《朱子大全》、《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书籍。李光地死后，入祀贤良祠。此外，康熙帝特意把朱熹从孔庙中的圣贤之列提升到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他说：“朕以为孔孟之后，有俾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钜。”^{【4】} 因此，他倡读经，推崇程朱理学，“以此为化民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5】} 康熙重用一批理学名臣，提倡尊孔读经，使士人潜心于程朱理学。这批理学名臣在阐述义理、宣传理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圣祖实录》，卷二四九。

【5】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九，《日讲四书解义序》。

四、重视文化建设

【6】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七，《学校论》。

康熙帝曾经说：“治天下者，莫亟于正民心，厚风俗”，因此，就要开办学堂。“学校者，教化所从出”。^{【6】} 他命傅达礼主持将《大学衍义》、《春秋》、《易经》、《孝经》、《孔子家语》、《劝善要言》等古代典籍翻译为满文，并刊刻、颁发。雍正帝同样重视文化建设，多次诏令各州县修志。雍正七年（1729年）复诏各省修通志，又诏颁各省府州县60年修一次的命令，因此，全国各府、州、县几无不修志。乾隆帝不仅继承其祖、父之志，修志多达100种，而且还进行大规模的图书收集、整

理活动。同时，为了笼络汉族士人，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之意，他还鼓励著述、刻书。他网罗大批汉族士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地搜集、编纂、注释、刊刻和出版古代典籍。

《清史稿·艺文志》载：

清起东陲，太宗设文馆，命达海等翻译经史，复改国史、秘书、弘文三院，编纂国史，收藏书籍，文教始兴。世祖入定中原，命冯铨等议修《明史》，复诏求遗书。圣祖继统，诏举博学鸿儒，修经史，纂图书，稽古右文，润色鸿业，海内彬彬向风焉。高宗继试鸿词，博采遗籍，特命辑修《四库全书》……又别辑《永乐大典》三百八十五种，交武英殿以聚珍版印行。……阮元既补《四库》未收书四百五十四种，复刊《经解》一千四百十二卷，王先谦又刊《续经解》一千三百十五卷，而各省督抚，广修方志。郡邑典章，粲然大备……而敦煌写经，殷墟龟甲，奇书秘宝，考古所资，其有裨于学术者尤多，实集古今未有之盛焉。^[1]

【1】《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五，志一百二十、艺文一。

五、厉行文化专制

清朝入主中原后，汉族士人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和反抗专制统治的思想并没有泯灭，为此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对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严厉的控制，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主要表现在迭兴文字狱和销毁、禁止出版不利于其专制统治的书籍等方面。

（一）迭兴文字狱

文字狱是专制皇帝以文字作品定罪，在文化、思想方面采取的非人道的极端残暴的措施。

“清初禁网尚疏，有志著作之人，裒集明代史实，并不甚知